

1914

水與人

14

14

魚山鉤沉

甘建波 著



第55輯

中山文史第五十五輯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真山韵沉



甘建波 著



封面照片：沙边村清代民居的满洲窗

封底照片：沙涌村湖洲山上的文笔塔（清代光绪重修）

香山钩沉 甘建波 著

中山文史 第五十五辑

主办单位：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出版：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中山文史编辑部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中山市逸仙路火炬开发区）

*

850×1168×1/32 8印张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第1次印刷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2004]粤印准字第0068号

印数：1—3500册

特别鸣谢阮伟雄先生

中山文史第五十五辑

政协广东省中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笔者的话	(3)
务实的文物工作者	
——《香山钩沉》序	(5)
中山历史文物综述	(9)
中山史前文化研究	(20)
中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26)
中山岁时习俗	(31)
中山民居演绎	(67)
中山古代殡葬史话	(91)
中山古迹有觅处	(98)
中山人在澳门的史话	(100)
人日·万人行·新民俗	(105)
中山木龙与醉龙	(112)
中山木龙舞的艺术特色	(115)
中山民歌	(117)
中山闽语	(120)
元宵闹花灯	(124)
开灯酒	(126)
南朗乡土史话	(128)
民间红木雕刻艺术之乡大涌	(183)
濠头舞木龙之传说	(189)
奇特的小榄水色	(192)



崖口民间艺术综述	(195)
黄圃飘色	(199)
龙瑞五祠	(202)
古墓调查引出的传说	(206)
一场打了九十年的官司	(208)
刘罗锅欲返乡祭祖轶事	(211)
久别乍逢的剃头铺	(215)
清明扫墓	(217)

附 录

父亲的故事	(219)
关于鉴定与鉴赏	(223)
文物收藏与鉴赏	(227)
“四宝”及收藏	(229)
古玉赝品浅说	(231)
中山文物知识问答	(233)

后记	(246)
----	-------



笔者的话

出生于50年代初的我，一岁多一点就被父母送进了县机关幼儿园，过上了集体生活，到了六岁就上了小学读书，也许在大集体中生活惯了之缘故，小学毕业考上了中学，又过上了集体生活，直到高中毕业。在那个“学工、学农、学军”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想好好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是很难的，高中的学习也只不过是整天的“不务正学”，所以我充其量只能算是初中毕业，刚满17岁就步入社会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后，一直从事歌舞演出，虽说是在文化部门工作了三十多年，可是，拿笔写作是近些年来才尝试的。而这些年来所学写的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文章”，大部分都与日常工作有关，又或是一些个人的感触。

由于我的父辈出生在山区，我在父辈生长、战斗的地方生活学习了多年，而我的老家在中山市南朗镇翠亨的石门大象埔村，因而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石门山人”。

其实在1986年开始，我参加调查、编写《中山市文物志》的时候，就接触到编写志书的工作了。至于写作，是从1981年2月到9月，我有幸被选送到广东省电视台学习电影拍摄，随刘立冲、周伦爽、罗远峰等老师学习电影的拍摄、新闻采访、电视片解说词的写作、编辑以及电视片、新闻片的制作起，应该说，这是我这个“高中生”重新学习写作的契机。从广东省电视台学习毕业回中山后，我又参与创办了中山图片社，由于当时中山没有新闻报刊，我又充当了中山的“记者”，既拍摄图片又要写文字报道。1983年到1984年期间，我有幸师承原中国新华社和人民画报社的著名摄影家



石少华、蔡尚雄等老前辈学习，在学习拍摄的同时，他们还对我讲授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新闻采编等知识，这对我以后的工作，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影响很大。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由于参与编写中山地方志的缘故，我开始写一些中山的史料调查文章。进入八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些摄影作品和文章被《人民画报》、《广东画报》及《羊城晚报》、中山的《中山日报》、《香山周报》、《中山文史》、《中山画报》、《天南》等报刊陆续采用并发表，甚至中山人民广播电台还特邀我前去做《天南地北人间情》的临时“节目主持人”，介绍中山的风土人情……

从80年代初，我参加了中国民俗文化学会后，在日常工作中比较多的接触到中山的民俗文化和民间艺术活动，因此在平时的写作中，多以中山和其他地方的民俗文化为主题。2002年我写了一本《中山民俗与民间艺术》的书，作为中山历史文化丛书之一公开发行了。这一本《香山钩沉》，是将我自1986年到2002年以来在一些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整理成集，就作为我初学写作的小结吧。

甘建波

2004年1月于中山



务实的文物工作者

《香山钩沉》序

建波兄向我出示他的新著《香山钩沉》，允我先睹为快。但又“打蛇随棍上”，要我为他的文集写序，我虽为难，但却知道，这是不好推辞的。

执笔踌躇再三，谈些什么好呢？还是从他的别号说起罢。

建波自号“石门山人”，“山人”二字究作何解？

在我印象中，建波体形健硕、膀大腰圆，声音洪亮，个性张扬，在南方人中间，已经可以称之为“大汉”了。他娶了位蒙古媳妇，伴媳妇回过几趟娘家，据说，他和蒙族兄弟对酒当歌，谈笑聊天，也很合得来，那就由“大汉”晋升为“大汗”了。

建波祖籍五桂山革命老区的石门村，父亲甘子源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五桂山根据地反日寇大扫荡期间“三山虎血战”的英雄和幸存者，还是一位颇有水准的摄影爱好者。有一点，读者不可不知：在半个多世纪前，照相机是一种非常昂贵罕见之物，拥有的人不多，所以他现场拍下来的纪实照片，不仅在当时曾发挥颇大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的作用，到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更成了历史的见证，上世纪末中山举办的《旧貌换新颜》历史图片展中的老照片，很多就是由他提供的，堪称“珍本”和“孤本”。

建波继承了他父亲的豪雄本色与艺术基因，年轻时参加过宣传队，能歌善舞。后来转到图片社工作，也象父亲当年那样，带着照相机跑遍中山。这么一个闲不住、甚至略带鲁莽的人，与那种玉树临风、弱不禁风、羽扇纶巾、离群索居的古代“山人”，怎么也联



系不起来。说到底，所谓“山人”，无非是一位在山区长大的孩子的自称而已！

我之认识建波，是在他调到市博物馆工作以后。市博物馆成立于1984年，馆址是旅美华侨萧悔尘在上世纪初捐建的侨立医院故址。房屋倒挺有文物价值，外观也很漂亮，但刚成立的博物馆正处于草创阶段，馆藏有限，经济也很困难。就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建波与博物馆的其他同事一道，与来自省里的文物专家紧密合作，扛着锄头，携着小铲，先后在龙穴等地发现了一个接一个新的石器时代遗址，一举填补了中山历史上的一大段空白，把中山历史从县志记载的汉代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以前！

那时，我在《香山报》负责编务，建波常向我通风报料，有时则直接把文物发掘的新发现写成报道，拍下照片，送到报社来。实际上，这也正是他从事文物工作的发端。这以后，他参加过多期由省和国家文物部门开办的短期培训班，最后又调到市文化局文物科工作，越来越丰富的专业知识，越积越厚的本乡本土文字、照片资料，逐渐令他成为市内不多的这一专业里的行家里手，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可以说是“谁可争锋”的了。

他的《香山钩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大抵上，那都是他近二十年来所写的关于中山文物与民俗风情的文章，属于笔记性质，体例并不一致，有的是心得体会，有的是通俗解说，有的是原始记录，有的是资料汇编，有的甚至是大胆臆测，……文字略嫌粗糙，但抢救意识相当强。文史工作就有这个特点，今天还是好端端的，似乎唾手可得，睡一觉明日再去，便已人去楼空，徒叹奈何了。所以哪怕是囫圇吞枣也罢，只要能及时把它抢救、保护下来，就已对子孙后代功德无量，至于深入研究，整理开发，日后有的是时间。

建波是位有心人，一位务实的文物工作者。令人钦佩的是他对工作的狂热和投入。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与文物有关，让他“拾

棺材，拉死尸”他也决无忌讳，决不在乎。市博物馆里，有一具近年从五桂山镇长命水村出土的清代腊尸，从出土之日起，为了考证研究，他已陪伴这位几百年前的“古人”（不是“故人”！），不知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而从80年代末他担任慈善万人行艺术队伍指挥的那一天起，他又投身于中山民间艺术的发掘、整理与组织演出工作。至今我脑海里还浮现着这么一幅画面，那是在本世纪初，当澳门渔行醉龙队回中山寻根认祖时，他与醉龙队的队员一起，在被灌得酩酊大醉后，浑忘自我狂舞龙头的情景。这有照片为证，都刊登在报纸画报上了。

建波自己从电脑的键盘上敲出的这10多万字，都是他的这些经历与研究心得的忠实记录。行文或可挑剔，资料却是翔实可靠的。仅就这一点，已经弥足珍贵。没有像他那样的有心人，再过十几年、几十年后，中山的文物保护与民俗研究很可能又将出现新的空白。古代的空白，我们可以解释为年代久远、生产水平低下、文化落后、资讯不发达……等等、等等；要是到了21世纪，还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疏忽、漠视以及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因而出现新的空白，我们将如何面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呢？

我在业余也喜欢写点关于乡土历史与民生民俗的小块文章，因此很能了解建波所从事工作的份量与意义，这正是我虽然为难，却终于爽快地答应为他的文集写序的原因。

其实，文集中所辑录的许多文章，我早就在报刊上阅读过了。正如许多读过这些文章的读者一样，在赞赏之余，我也认为，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上，今后当他再写新作时，确有值得注意和改善的地方。材料翔实，那仅仅是对文章的最起码的要求，如何立论、论证，那才是文章成败的关键。尤其是运用从别人著作里“拿”来的专业知识时，必须更加仔细地分析它的哪些部分可以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哪些是用不上的，产生异同的历史和区域原因又是什么？人们常说，文史研究，可以发挥其资政和借鉴的作用，那是



在吃透了地域特色之后，才会具有实际意义的。至于属于“大胆推测”的部分，往往最具创意，也最耐读。但在“大胆推测”之后，就该“小心求证”了。例如关于刘罗锅的祖籍是否香山，在全国范围内，建波是第一个论述到这一点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既谈了实物凭证，也谈了族谱记载，还引用了民间传说作为佐证，因此读来有趣，也颇有可信性。但仔细推敲，他引用的族谱，其实只是香山刘氏的族谱，刘镛的后裔接受不接受就是一个问题。如果能翻翻清史，找来刘镛的传记，再设法查对山东、南京刘氏的相关族谱，如果真能对上，那就不仅是臆测，而是无可怀疑的定论了。在这些方面，建波今后是可以做得更多更好的。

不知建波意下如何？

刘居上
2004年4月



中山历史文物综述

中山，这块土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为百粤地。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统一岭南，设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当时中山属南海郡。汉初，“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¹，“秦已破灭，佗即出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²中山属南越国。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复置南海郡，属番禺县地。晋以后为东官郡地。唐为东莞县地。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分置香山县，属广州。元代属广州路。明、清代属广州府³。1925年4月为纪念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将香山县改称为中山县。1983年12月中山撤县设市（县级市）；1988年1月1日升格为省辖地级市。

香山县县名由来，可从史籍里寻找它的踪迹。北宋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年）撰《太平环宇记》载：“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清道光七年编撰的《香山县志》卷一载：“……以里数计之，（香山）疑即今县东南五桂山。盖县名所由锡也。”清代学者认为香山县实因五桂山上有神仙花卉称香山而得名。此一说言之成理。

中山市山川秀美，物产丰富，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北纬 $20^{\circ} 11' \sim 22^{\circ} 66'$ ；东经 $113^{\circ} 39' \sim 113^{\circ} 46'$ ，总面积为1800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35万人，旅居世界五大洲87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有80多万人⁴，是广东省重点侨乡之一。境内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可分为三角洲平原区、丘陵台地区和海积平原区。五桂山、竹篙岭等突屹于境内的中南部。珠江水系的主干流西江，自顺德分东、西直泻入境，一支从横门水道出珠江



口；一支从磨刀门出南海。

中山市位于珠江口的西岸，珠江三角洲的西南端。地理学家们认为：“珠江三角洲是在三次海侵和三次海退的过程中发育起来的，这是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的基本过程；而海侵、海退的交替，是全球性气候变迁和海平面升降变化的结果。”⁵在这演变过程中，中山全境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受过三次全面的海侵。香山县在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设县治于石岐，但只能说明五桂山北麓已有平原堆积，而尚未与西江三角洲平原连接起来。宋代乐史著《太平环宇记》载：“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很清楚地说明了当时的五桂山位于大海中，可以说香山县成陆年代是宋代以后的事。不过从目前的考古新发现证明，五千多年前就有古代人类生息、繁衍在中山这块土地上。

中山市境内的文物普查工作，开始于1957年3月，当时广东省文物工作队在境内调查到九处古遗址。时隔二十多年之后，从1982年开始，在中山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对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尤其是1985年成立了市博物馆以来，共调查发现古遗址15处；古墓葬5座；古建筑34处；摩崖石刻3处。并调查、发现及修复、保护了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建筑，如孙中山故居、珠江纵队司令部等25处。初步了解了中山市文物分布状况。

中山境内史前和先秦、两汉时期的古遗址、古墓葬，经考古调查在南朗龙穴、泮沙、翠亨海边、下沙、崖口、平顶；张家边小隐、宫花；三乡古鹤；沙溪涌边；大涌安堂等地均有发现。古遗址和古墓葬常在沙丘上发现或出土。从发现的文物点和古遗址所处的位置分析，它们多数分布在五桂山周围。距今7500~5000年，为著名的大西洋期海侵期⁶。当时的五桂山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上有海拔530米的最高峰，山麓有山体形成的多曲折海岸和大海湾。海湾岸边是河流冲积和海浪沉积形成的沙丘、沙堤。古遗址和遗物就在上述地点发现，向人们证明了早在四五千年前，古代居民已知舟楫之



利，从居住的海滨渡海到附近海岛上居住，进行渔捞生产活动。以南朗镇龙穴遗址为例，遗址原是伶仃洋西岸海边一片大沙丘，位于南朗镇东边龙穴头村北面，东面离海边2.5公里。1990年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山市博物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共同发掘了龙穴遗址。遗址堆积的第三层是距今五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文化层，并有着惊人的重要发现。文化层中出土了彩陶圈足盘和彩陶碗，是古代居民用来盛放食物用的器皿。盘、碗均泥质陶，用手制成形。彩陶盘形制为敛口、钵形圈底，下加矮圈足；器表用赭红彩绘上条带、点彩、水波纹及刻划水波纹、曲折纹和镂孔装饰。彩陶碗形制为敞口、斜壁、深腹、圈底，下加喇叭足。除上述彩绘花纹之外，还有圈点纹、锯齿纹、“S”纹等。这些彩陶器上的花纹是当时制陶者绘画作品，同时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物。众所周知，距今六千多年至四千多年前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器是最常见的生活器皿。凡是该地区这个时期的古遗址中，彩陶器残片俯首可拾。而地处岭南的广东，迄今为止，仅在粤东海滨和珠江三角洲南端海滨及岛屿，还有三角洲顶端的高要广利蚬壳洲遗址中有少量彩陶出土。象南朗龙穴遗址考古发掘所得的彩陶器竟达五六件之多，实属难得。与彩陶共存的陶器，有炊煮食物用的绳纹夹砂陶釜，支撑陶釜用的陶支脚等日用器皿。与陶器一起出土的当时人们使用过的生产工具，有石镑、石斧、石锤、石圆饼和加工石器用的砺石；拍印陶器花纹用的石陶拍；还有用于敲开贝类外壳的打制砾石石器。考古学者常常用分析生产工具种类、形制特点和遗址周围环境来判断当时古代人群的经济生活方式。龙穴遗址出土的石器，器体较小、石器种类不多，不宜用于原始农业。当时遗址是海边一段沙堤，面临海湾，背后是低岗，西部是五桂山，我们推测距今五千多年前，住在龙穴的古代居民生产活动，主要是捕捞海上的鱼虾贝类和在森林中狩猎为生。

考古学者惊喜地发现在翠亨镇海边沙丘采集的一件釉陶圈足



壶，器表拍印条纹，器腹刻“口”符号的，是一件粤东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典型器⁷。该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区在粤东和闽西南，年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1984年在翠亨镇对面海中淇澳岛婆湾也曾采集到一件拍印条纹釉陶壶（残）。此类文化遗存常见的拍印条纹釉陶器，尚未在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区发现过。正是这些看来不起眼的文物，证明了早在三千多年前，粤东地区的古代居民已懂得乘舟沿着浅海区向西到达珠江口附近的海岛活动。距今约3500年前夏商之际，考古发现证明也有人群在五桂山周围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这时期的陶器如龙穴沙场采集的夹砂红陶带流罐，侈口、高领、用手捏口沿的一端制成流口、斜削肩、下腹内折、圜底、素面。夹砂黑陶釜，形制特点是侈口或宽沿外卷、削肩，腹部最大径靠近器底。陶器器表拍印规整的曲折纹和云雷纹。同时还采集到一件石戚，援部斜长，锋已残，有上下阑，内有穿后端斜，是件早期石戚，但又区别于粤东浮滨墓葬出土的宽援短内似圭形的石戈。很可能这类石戈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代表性器物。陶器中带流折腹罐是该期典型器。1984年在珠海前山造贝沙丘遗址曾采集到一件通体拍印曲折纹的带流夹砂陶罐。带流陶器在广东境内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粤东浮滨类型文化遗址出土的有流釉陶壶；石峡遗址第三期（中层）墓葬出土的有流带把圈足壶等。几何印纹陶花纹中的云雷纹也是这个时期流行的纹饰。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古代人群之间的相互交往比前期频繁，反映在考古中发现的古代文物，从器物形制到几何印纹的纹样、陶器制作技术，逐步接近，趋向统一。其考古学文化特征：陶器以夔纹陶圆底罐、原始瓷豆、钵和青铜斧、钺、戈、匕首、刮刀、矛等共存，是岭南地区几何印纹陶繁荣阶段。纹样的种类有十几种之多：有夔纹、云雷纹、凸方块纹、凸菱纹、方格纹、圈点纹、刺点纹、弦纹、曲折纹、圆圈纹、刻划纹、旋纹、重圈纹等。陶罐肩部附两耳或四耳，器耳形状流行兽形耳、拱桥形

